

微观史研究中的历史普遍性问题*

——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理论再探讨

李 根

【提要】 卡洛·金兹伯格基于“正常的例外”和“推定性范式”的概念理路,论证反常特例何以揭示历史普遍性的理论依据。他针对司法档案中的话语权压制迹象,推断反常案例可能是被有意隐匿的普遍现象,是“正常的例外”,同时辅以“推定性范式”概念支持这种推测的可靠性。金兹伯格强调,“推定性范式”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科学范式的、适用于分析个性化现象的方法论范式。金兹伯格对微观史在以小见大的问题上的理论探讨比其他微观史学者更为深入,他没有过分倚重人类学模式,而是更倾向以史料考证为要旨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不过,推测方法与史学的实证原则有所抵触,其合理性仍有待商榷。

【关键词】 卡洛·金兹伯格 微观史学 历史普遍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观史学”的出现引发了长期热议。这种研究聚焦以往少有关注的底层小人物个体,揭示其细腻的生活与思想细节,虽有新意,但始终面临使历史学“碎片化”的质疑。因此,微观史研究必须要在学理上论证所研究的个体可以代表更为普遍的历史现象,表明其研究对象具有历史学研究的普遍性价值,而非仅仅是一段逸闻趣事,即做到“以小见大”。微观史学者乔瓦尼·莱维曾就此谈道“如果这个问题不被严肃对待,微观史学将流于一种逃避主义,接受碎片世界而不试图理解它。”^①

近十多年,微观史与全球史的联系越发紧密。“全球社交场所的微观史”视角的提出,为微观史的普遍性诉求提供了合理路径。它以跨区域的经济文化活动集散地为对象,所揭示的微观细节同时带有区域乃至洲际互动的意义。^②这种“微观全球史”的思路虽然合理,但不能解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微观史学研究所面对的质疑,因为那时的研究对象多是隐匿于社会边缘的异类和特例。

一般而言,形成普遍性认知的逻辑,需要基于相当数量可识别出共性的个体案例。如黑格尔所言“经验的材料、直观的杂多和表象,最初都自为地实有,然后知性去到那里,在它之中带来统一,并且通过抽象把它提高为普遍形式。”^③可是,微观史学研究往往仅掌握一个个案,不具有可供抽象的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卡洛·金兹伯格的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8BSS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6 - 117.

② 参见汉斯·梅迪克《转向全球? 微观史的扩展》,董欣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③ 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9页。

材料基数。如何说明一个具有明显特殊性的个案是更为普遍的存在?多位微观史学者并未从学理上给出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意大利的微观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伊什特万·西亚尔托在《微观史是什么:理论与实践》中指出“意大利微观史的典型特征是,回答大历史的问题和达成普遍性结论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改变。”^①作为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代表,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1939—,也译作“卡罗·金兹堡”)从史料分析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两个概念“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和“推定性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前者是指史料中冲突意味的特殊个案有可能证明某种被有意隐匿的历史普遍现象,后者则强调这种“以小见大”的判断中所使用的推测具有合理性。这两个概念均是基于从特殊个体中探讨历史普遍性问题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上述两个概念入手,基于金兹伯格的两部微观史学作品《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以下简称《夜间的战斗》)与《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以下简称《奶酪与蛆虫》)解读他用个案揭示其为普遍存在现象的理论思路。同时,通过比较几部有代表性的微观史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总结金氏微观史学研究以小见大的独特价值,并对之合理性及不足之处做进一步探析。

一、“正常的例外”与微观史研究中的历史普遍性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微观史学,主要是基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历史考察。受限于过往记载的精英倾向和社会底层文盲率高的客观条件,关于小人物生活细节的史料难得一见。通常,小人物只有与统治阶级形成冲突时,才能在文字材料中出现。因此,这些小人物往往具有显著的“例外”属性。不过,在金兹伯格看来,这些因小人物而起的阶级冲突性可能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正常的例外”,是可以解读为一种可能尚未被发觉的更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是金氏微观史在史料分析环节的独特视角。

“正常的例外”概念由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爱德华多·格伦迪(1932—1999年)提出。^②金兹伯格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它意在揭示这样一种情况,即社会底层的普遍活动因受到统治阶级压制,而在档案记载中被有意隐藏或歪曲,成为一种看似例外的事件。因此,在金兹伯格看来,如果史料记载的例外事件中有某种阶级间的观念冲突,那么这可能是一种因被压制而不为人知的普遍事件,即便它只来自一个微弱的反抗声音。他说“即使是一个有限的小例子,也可以是代表性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定义某些东西的潜在可能性,它只有通过近乎全部来自‘被压制的档案’的、片段性的和被歪曲的文献,才会为我们所知。”^③因此,金兹伯格指出“如果资料对底层阶级的社会事实避而不谈或是进行歪曲,那么一个真实而例外的(并因此从数据上看不是频繁出现的)文献可能比一千份千篇一律的文献所揭示的多得多。”^④一份“孤证”的普遍性解释有了初步的理论支撑。其逻辑在

① Sigurður G.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g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13, p. 17.

② Edoardo Grendi, “Micoranalisi e storia sociale”, *Quaderni Storici*, Vol. 35, No. 7, 1972, p. 512. 这一概念有时也被金兹伯格表述为“例外的正常”(the exceptional normal)。

③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xi.

④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in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trans. Eren Branc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

于,如果史料中关于某个特例的描述透露出某种话语权压制的迹象,那么这个特例在现实中可能并不特殊,而是代表着基数更大的常态。金兹伯格要做的是“一项起初以一个个体,且明显是不正常的个体为轴心的调查,最终发展为一种关于前工业欧洲的大众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农民文化)的普遍性假说。”^①

表面看来,金兹伯格的微观史研究对象都是社会异类。《夜间的战斗》展现的是16和17世纪意大利弗留里(Friuli)地区的一群自称“本南丹蒂”(benandanti)的乡间异教巫师。他们声称自己会在夜间灵魂出窍后进行秘密集会,并为了庄稼丰收而与邪恶巫师战斗。他们不抵制参加天主教活动,不向平民施巫术,是正义巫师。直到他们被听闻此事的地方神父告到宗教裁判所,当局才知道这群巫师的存在。金兹伯格指出,本南丹蒂的存在不仅令宗教法官惊愕,在历史学家看来也是例外,因为它“很可能被严格的历史学家视为活生生的证据,即那些无知者固执地无视教会当局颁布的命令”。^②同样,在《奶酪与蛆虫》中,金兹伯格研究了16世纪意大利山村的一个敢于向教会和世俗当局挑战的村民。此人外号“梅诺乔”(Menocchio)。他因针砭时弊而吃上官司。审理案件的宗教法官对其言论大为惊讶,金兹伯格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也惊奇,为何这个村民在没有村外经历的情况下产生如此多的奇思妙想。梅诺乔“主张异端,但并非异端领袖,尽管他的意见引起人们的兴趣,却几乎未能影响周遭的言论”。^③本南丹蒂和梅诺乔都是金兹伯格在16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审判记录中意外发现的。虽然他们的“例外”特征显著,但金兹伯格从宗教法官那语带玄机的问话中察觉到,这些“例外”形象可能是法官把控了材料话语权所致。

在《夜间的战斗》中,金兹伯格在司法档案中发现了本南丹蒂的最初形态被压制和歪曲的迹象。从材料中看,几个本南丹蒂最初受审时,由于认为自己人畜无害且信奉天主教,因而坦然承认自己掌握巫术和参加夜间集会。可是,法官总是不依不饶地诱导他们讲出异教活动的细节,意图将之定性为危害人间的邪恶巫师。例如,当本南丹蒂为表示自己是对天主教的虔诚,声称曾使基督的天使向自己显灵时,法官却立刻将之纳入中世纪普遍流行的鬼神论中,^④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出卖了灵魂而使魔鬼现身。金兹伯格在此提示读者注意:“加斯帕鲁托(一个受审的本南丹蒂)谈及天使,完全成为了弗拉·费力切(法官)确认本南丹蒂的‘夜游’和夜间拜鬼仪式根本上都是带有邪恶属性的必要条件。”^⑤他由此提出一种涉及历史普遍性的假设:“这揭示了本南丹蒂这种带有如此明显的大众属性的祭祀活动,是如何渐渐在宗教裁判所的压力下发生变化,并最终变成了传统巫术的鲜明样貌。”^⑥金兹伯格认为,当时天主教信仰与地方性祭祀共生可能是种常态,但在法官这里变成了一个稀奇又罪恶的“例外”。

在《奶酪与蛆虫》中,金兹伯格同样提醒读者注意史料中的大众形象有被歪曲的可能。梅诺乔类似启蒙思想家式的言论的确令人意外,但村民却是在他“大放厥词”30年之后方才将之告上法庭。

①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 xii.

② Carlo Ginzburg, *Threads and Traces: True, False, Fictive*, trans. Anne C. Tedeschi and John Tedesch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 222.

③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页。

④ Christopher S. Mackay, *The Hammer of Witche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1-92.

⑤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 Routledge, 2011, p. 10.

⑥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p. xviii.

金兹伯格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村里人指控他,然而他的言论每个人都是知道的。”^①他对此的解释是,梅诺乔只是就宗教法官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文化而言的例外。当梅诺乔的言论超出宗教法官的预想时,后者便将前者判定为某种不良的异类。他说“差异性的抵触可以从心智层面被体验到。宗教法官对事实(当然,是他们自己认为的事实)的步步紧逼,已经为我们制造了相当丰富的证据——然而,也是因心理和身体上的施压而被深深歪曲了的证据,压力在巫术审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②易言之,村民长年的无动于衷从侧面呼应了金兹伯格关于“正常的例外”的判断,而法官的大惊小怪,是因阶级文化的错位导致的少见多怪。“正常的例外”的理念,实际上是在提醒研究者警惕那种根据史料数量判定可信度的习惯性思维。众口一词的史料有可能是主流文化压制政策的产物,为数不多的“反调”反而有可能反映出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如他所说“在一些例外性的案例中,我们获得了一番真实的对话:我们可以听到独特的声音,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差异的、甚至是冲突性的不协调……都表明我们这里触及到的,是一个法官完全陌生的、表层不可见的文化圈层。”^③

以“正常的例外”的理念为基础,金兹伯格从他研究的“例外”中看到了代表某种不显见的社会底层普遍现象的可能。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正常的例外”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推测性。与那种有大量史料基础,可以通过归纳或统计进而谈及普遍性分析的学理不同,它的结论是基于个体阐释直接“跃升”至普遍性判断的层面。实际上,仅凭于此,金氏微观史的普遍性指向并不充分。诚然,由于材料的限制,“例外”研究的确没办法从数量上满足普遍性判断的条件。对这种个案作“以小见大”的分析并不容易。可是,退而求其次地以推测进行以小见大,这个逻辑链条看起来仍是薄弱的。不过,金兹伯格对之合理性有进一步的论证。他提出了“推定性范式”的概念。

二、“推定性范式”的逻辑合理性

金兹伯格在《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以下简称《线索》)一文中,强调推测方法实际上属于一种长期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方法范式,他称之为“推定性范式”(有时也被他称为“症状学范式”)。^④金兹伯格进一步指出“这种知识的特征是,能够从表面上无足轻重的经验性信息,追溯复杂的、无法直接经验的现实。”^⑤通过细节和迹象,可以对事物或事件的全貌进行可靠的推断,这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推测方法”。金兹伯格欲通过它证明“微小的线索如何被一次又一次地用于揭示更加普遍的现象”。^⑥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基于个案推测普遍性的方法,也就是“正常的例外”的以小见大逻辑提供了依据。

其一,金兹伯格认为,以小见大的推测方法自古有之,大量实践已证明其作为方法论范式的合理性。《线索》一文列举了十多种有古老传统的知识门类。其中,狩猎活动、医学诊断、侦探断案最具说服力,也较为接近历史学研究的知识形态。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人们无法直接看到想要了解的

①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 3.

② Carlo Ginzburg, “The Inquisitor as Anthropologist”, in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58.

③ Carlo Ginzburg, “The Inquisitor as Anthropologist”, p. 9.

④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陈栋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18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4—30页。

⑤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13页。

⑥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37页。

事物本体,只能通过本体留下的少量细节迹象去推定本体。猎人看不到猎物,但“他学会了如何借助泥地上的足印、折断的树枝、粪便、毛发、缠结的羽毛、残留的气味,重现不见踪影的猎物的形象与动作”。医生无法打开病人的身体分析病症,但“透过表面的症状,诊断出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疾病”。侦探看不到罪犯是谁,但“从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线索中,发现罪犯的身份”。^①这与我国古语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异曲同工。

金兹伯格还介绍了“推定性范式”在相面术、语文学、古物学、艺术鉴赏、笔迹学、烹饪、水文学、兽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广泛运用。这些活动和知识的运用,是基于日常熟能生巧的直觉和经验,而非成型的知识体系。他认为,是生活中无数的实例而非科学求证,证明了其可靠性。他说“人们并不是从书本中学习这些知识的,而是通过鲜活的声音、姿态与眼神;这种知识是基于那些无法被形式化,甚至常常无法言表的微妙细节;所有社会阶层的男人和女人,都继承了这些知识所构成的宝贵财富。”^②

其二,金兹伯格认为,以小见大的推测方法易受质疑,是自然科学范式的压制所致。在他看来,现代物理学的诞生确立了自然科学范式的主导地位,而没法基于物理属性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遭到排挤。他说“从伽利略开始,自然科学便以量化、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方向,这将人文科学置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两难境地。”由此,通过量化分析而总结规律的方法,被认为比基于直觉和经验的推测方法更能获得普遍性认识,而“以伽利略的范式作为科学性标准,我们以上说是‘推定性’的那些学科,明显根本就不能算作科学”。^③

在金兹伯格看来,当量化分析方法把控了合理性的话语权,“个别性的特征愈是重要,便愈不可能获取严密的科学知识”这种逻辑的确立,引发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将一种研究类型的特征扩大为所有研究类型的统一标准,使其他类型的合理性被误解和抵制。他说“伽利略的范式所产生的影响使人们倾向于认为,对反常现象的研究次于对常规的研究。”^④二是自然科学范式对推定性范式的压制,导致研究的敏锐性在量化分析过程中被淡化了。他指出“伽利略式的物理学家在进行本职工作时,对声响充耳不闻,对味道和气味无知无觉;而与他同时代的医生,则倾听胸腔内的杂音、嗅闻粪便、品尝尿液,冒着风险做出诊断。”^⑤也就是说,金兹伯格认为推测方法不被视为一种可靠的研究工具,不是由于其本身不可靠,而是由于片面的“范式压制”。

其三,金兹伯格认为,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决定其研究类型必然属于“推定性范式”的范畴,特别是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基于残留的细节,通过直觉和经验,可以推知普遍现象的存在。在他看来,历史学知识的对象具有个别性和间接性两个特点。一方面,“历史学家……认知事物的方式,同样还有他的语言,本质上都是个体化的(这里所说的个体可以是一个社会群体,或者是一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和医学知识一样,历史学知识是间接的,需要依靠推定和猜测”。而这证明历史学是更贴近“推定性范式”的知识。因为“推定性范式”的知识就是“定性的(qualitative),以个别(individual)的事件、状况与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金兹伯格看来,“这便是为何历史学从未成为一门伽利略式的科学”。^⑥

①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13、12、7页。

②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28页。

③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38、17页。

④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25页。

⑤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20页。

⑥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18页。

金兹伯格通过对“推定性范式”的普遍有效性和现实必要性的论证,为微观史学研究的普遍性诉求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它证明“正常的例外”中的推测成分具有可靠性,其基础是史家特有的职业直觉和经验;另一方面,金兹伯格也在微观史研究中直接运用推测性的方法,将一些在时间或空间上并不具有直接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推断他所研究的个案是更为普遍的存在。

在《夜间的战斗》中,金兹伯格提到,由于材料限制,他无法辨别出本南丹蒂的宗教和祭祀活动起源。他说“在本南丹蒂的陈述中,完全没有可供假设的仪式起源的痕迹。”而当他扩大时空视野,考察欧洲的地方性宗教信仰时,则发现至少有两种古老的地方性活动存在相似特征。一个是北欧关于冬神与夏神争斗的民俗。他说“看起来更合理的,或许是本南丹蒂与巫师的对战,类似于中欧北部一些地区曾经上演且今天仍在继续的冬神和夏神(或者是冬神和春神)的争斗。”^①第二个是东欧的利沃尼亚狼人案件。该案件中受审的老人表示他会在夜间化为狼人出行,为了庄稼丰收与恶魔战斗,其“正义巫师”的形象与本南丹蒂有多处相似。基于上述这一在大时空范围内的相似性案例,金兹伯格做出了关于欧洲前工业文明时期民间信仰体系的普遍性假设“很明显,利沃尼亚和弗留里两地相隔遥远,但从遗留的痕迹看,所涉及的都是同一种农业崇拜,因而这种崇拜必定曾经在一个非常广大的地域范围里,也许是在整个欧洲的中部早为流传。”^②

在《奶酪与蛆虫》中,金兹伯格在临近尾声的部分用几个章节分析了两个与磨坊主梅诺乔持类似世界观的案例。一是在梅诺乔开始接受审讯的20年前,意大利卢凯塞(Lucchese)乡村一个化名为斯科里奥(Scolio)的人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与梅诺乔类似的观点。^③二是另一个磨坊主被指控为异端的案例。此案审理比梅诺乔案早十年,受审的是摩德纳的磨坊主“胖子匹吉诺”(the fat Pighino)。司法档案反映他与梅诺乔的犀利言论尤为相似。金兹伯格提醒道“他们生活的相似性令人惊讶,可能一些东西不仅仅是离奇的巧合。”^④

基于这两个相似案例,运用“推定性范式”的策略,金兹伯格使看似例外的梅诺乔成为引发普遍性假设的基点。易言之,三个类似的案例虽然没有形成材料意义上的普遍性依据,却暗示了那个时期可能存在某种不为后世所知的大众心态。金兹伯格推断说“这更为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证明。史料情况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一种几乎被抹去的、诸如来自前工业文明欧洲的底层口述文化渐渐失去了踪迹,留下的踪迹至少也被歪曲了。”他进而强调,小事例可能具有揭示更大范围历史潜在事实的价值“因此,诸如梅诺乔案的有限案例就具有了一种症候性(symptomatic)的价值。它强有力地抛出了一个只有如今才开始被意识到重要性的问题:无论是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欧洲上层阶级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大众来源。”^⑤

金兹伯格在这里采用了“症候性”一词。医学、病理、症状、症候,是他在《线索》一文中最常使用的关于历史学知识属性的形态比喻。正如他在文中所言“历史学家就像是使用疾病分类学图表来分析某个病人的某种特定病症的医生。”^⑥显然,金兹伯格已将“推定性范式”用于对梅诺乔案的历史普遍性考察。以医学病理的思路,他将欧洲的大众文化假设为一具患有隐而不现的慢性病的躯体。

①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p. 24.

②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p. 31.

③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p. 112 - 117.

④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 119.

⑤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 126.

⑥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39页。

梅诺乔就是这隐症的一次偶然发作,是躯体因不适而出现的“痉挛”。他虽不是整体本身,但反映了整体的存在状态。金兹伯格的微观史独辟蹊径之处,就在于他通过论证推测方法的有效,支持其基于个案推定普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在《线索》中,他认为“推定性范式”具有“灵活的严密性”。在他看来,推测方法的有效性论证,可以使历史学摆脱对单一范式的系统性依赖。如他所说“对这一范式的分析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徒劳无益的对立。”^①

三、金兹伯格微观史学的理论价值

人类学模式是微观史这种史学创新的主要借鉴对象,因此又被称为“历史人类学”。不过,金兹伯格关于“正常的例外”和“推定性范式”两个概念的论说和运用,使他的微观史学研究在借鉴人类学模式的同时,又体现出比之更具深刻理论性和更具历史学史料考证本色的独特价值。

其一,金氏微观史对以小见大的问题做了最深入的理论探究。目前,有影响力的几位微观史研究者在解读个案的普遍性暗示时,往往参照的是人类学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逻辑是:个体是其所在文明系统的缩影或样本,分析它则可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文明内髓。可是,人类学模式在如何确证其选择的个案具有典型性,从而可以由之提炼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并未给出学理上的解释。克利福德·格尔茨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从民族志描述所收集的……这些微观材料……达于那些民族、时代、大陆或文明的巨大文化景观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②因此,倚重人类学模式的微观史研究在以小见大的问题上找不到理论依据。勒华拉杜里对个案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采取“冷处理”。他默认其研究的小村子是更大区域内的典型。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以下简称《蒙塔尤》)中,他直接声称“蒙塔尤的这种家庭与附近比利牛斯山的家庭差别不大”。^③何以得出这个判断,他未作解释。娜塔莉·戴维斯和达恩顿承认自己的研究仅是推测,无法提供更多的可靠性。前者称自己的研究是“经过过去的声音严格检验了的发明(invention)”,^④后者通过猫的象征意义阐释印刷铺学徒和工人杀猫并发出怪异哄笑的社会原因。但是,他对自己的阐释也没有把握“我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难题。”^⑤显然,这几位微观史研究者在以小见大的推测问题上都未从学理上找到依托。

相比之下,金兹伯格提出“正常的例外”和“推定性范式”两个概念,针对微观史研究的特殊个案何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供了理论辩说。他明确地指出所选个案的例外性,并对个案与孤证、例外与正常的关系做了解读。这一点,其他微观史学者没有做细致分析。他们从个案角度讲述事件始末时,更突出事件的特殊性或离奇性。而在从普遍意义上讨论问题时,则不作过渡地直接视之具有代表性或象征性。金兹伯格则通过“正常的例外”概念,正面说明了为何一起例外事件可以被视为普遍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对于以小见大中必然遭到质疑的推测成分给予正面回应,甚至跳出微观史学的话题范畴,从人类知识的整体方法论层面分析推测的合理性。这是其他微观史研究者均未触及的深度。

① 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第5页。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③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译版前言”第3页。

④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⑤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建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其二,由于有“正常的例外”和“推定性范式”作为理论基础,金兹伯格的微观史研究没有对人类学那种阐释模式全盘模仿,而是使之研究保持了历史学史料考证的本色。人类学研究讲求田野调查,即深入研究对象的日常情境中体验其各种行为的特定文化意义。微观史研究者对此颇为认同。《蒙塔尤》的序言标题就是“从宗教裁判所到人种志学”,将微观史研究比作法官的审问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①戴维斯也说“我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是把自己视为一个走入一个乡村,而且既对人种学又对实际表现感兴趣的人类学家。”^②学界在介绍微观史学时,也多基于人类学的特征对之进行概括。“厚描”“象征”“符号”“阐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二者共用的概念。^③可是,人类学研究模式探查事实的系统性条件是微观史研究者仅通过文字档案无法实现的。人类学家通过面对面访谈乃至置身其中的形式了解事实。除了言语的表达,神态、语气、处境等诸多“不言而喻”的因素为研究者提供了直观且立体的考察空间。而微观史研究者仅凭文字材料,在没法设身处地的情况下模仿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模式,无疑增加研究结论发生偏颇的可能性。

金兹伯格指出了人类学方法与微观史研究的史料矛盾问题。他强调“渴望中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融合,在其趋同的路上仍然有诸多障碍,而其间的首要障碍是两门学科使用文献的不同。”^④他意识到,文字信息中掺杂的大量主观性歪曲成分使历史学家无法全盘实现田野调查方法的效果。他说“那些从前的人类学家的表现会颇为过分,以至于阻碍我们了解被带到他们面前的不幸的土著的信仰和思想。”因此,他强调,“没有中立的文本;甚至一份公证人记录也暗示了一种密码,我们必须破解的密码。”^⑤

金兹伯格的微观史更强调在史料考证中揭示文本中隐匿的信息,通过属于“推定性范式”的方法,解读出不为人知的“正常的例外”。在《线索》发表后,金兹伯格不断强调从文本中的微末细节推断被掩盖的事实是历史学家可靠的独特技艺。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反驳后现代主义史学论调时强调,以小见大的推测不是主观性的滥用,而是克服被文本中的主观性误导的有效方法。他说“你不得不学会逆着纹理,逆着制造证据的那些人的目的理解证据。只有用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抵制相对主义忽视一者或另一者的趋势。”^⑥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无意间留下的提示:逆着意向阅读历史》中,他强调,以小见大的推测方法是马克·布洛赫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从无意间留下的证据中发现真相的专业本领。他表示《线索》一文来自马克·布洛赫的思想。他说“很多年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线索的文章……我对线索的强调也受益于布洛赫。”给他启示的关键文字是布洛赫关于历史学家发掘文字中潜在信息的技艺的论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注定只能从其留下的痕迹中知晓过去,但我们胜在知道了比过去想让我们知道的更多的东西。毕竟,这是一场智识对有限事实的伟大胜利。”^⑦在荣获“巴赞德奖”的发言中,金兹伯格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再次提到《线索》中的观点。他说“具体的视点会为一种具有普遍可能性的精细的研究计划——换句话说,个案——提供种子。”^⑧

①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第1页。

②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雷斯—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③ Sigurður G.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ó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19.

④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p. 4.

⑤ Carlo Ginzburg, “The Inquisitor as Anthropologist”, in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p. 161.

⑥ Carlo Ginzburg, *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9, p. 24.

⑦ 卡罗·金兹堡《无意间留下的提示:逆着意向阅读历史》,李根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18辑,第221—222页。

⑧ 卡罗·金兹堡《我们的话语和他们的话语:关于历史学家之技艺的反思》,李根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18辑,第250页。

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对个案的特殊性何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正面回应。同时,在微观史学普遍借鉴人类学方法时,他的微观史研究采用了更具历史学研究本色的史料考证方法。

四、金兹伯格推测方法的局限

金兹伯格为他的微观史研究中那些例外特征明显的个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基本逻辑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受史料限制,针对过去众多小人物实际生活状态的判断,往往只能基于孤证。其次,通过材料中透露出话语权压制的迹象,可以推测孤证所反映的现象有着更普遍存在的可能。其三,推测方法比印象中更可靠,从细节推知真相的技艺,本身就是研究不可量化现象的特有本领。这套逻辑是具体在史料局限和学科特性的双重语境下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它并不强调推测方法在可靠性上可与实证模式等同,而是在史料不足时的“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它暗示推测虽不是史学研究的理想论证形式,但其可靠性也不应因“伽利略范式”的主导地位而被忽视,毕竟它不是要归纳规律,而是揭示不为人知却普遍存在的现象。

虽然金兹伯格关于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推测的论说“于情于理”都体现了合理性,不过,其间仍有些难以服众的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正常的例外”概念的材料基础过于薄弱,以至于以小见大的判断仅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且对其他可能性判断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这并不是说个案代表着一种被当权者在记录中有意压制的更普遍现象的判断完全不可能,但坚实的历史结论不仅要求在自圆其说的逻辑中“证是”,还需要对其他可能性“证否”。金兹伯格按照文本中透露出的“话语权压制”形成普遍性判断是讲得通的,但没有提供排除其他可能性的配套论证。因此,他在史料受限,各种可能性并置的情况下,就断定其中一种可能性为事实,其逻辑的跳跃性未免过强。至少应在判断其他可能性程度远低于这种可能性之后,方可进入事实层面的细节分析。依据为数不多的本南丹蒂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以及宗教法官的威逼利诱的事实,当然有可能做出这是法官从记录中歪曲和抹杀更多本南丹蒂普遍存在的判断。可是,如果从这实际就是几桩特殊案例的角度,或者从它实际只是常规巫术活动的变体,“正义巫师”和不抵制基督教的说辞只是他们脱罪的策略而言,也完全讲得通。可以说,史料限制使金氏推崇的“正常的例外”概念有了用武之地,但这也使他的推测易遭到质疑。

其二,金兹伯格认为“推定性范式”因与“伽利略范式”冲突才被学术研究所抵制,但应注意,它与历史学的实证原则也有冲突之处。金兹伯格关于推测方法被“伽利略范式”压制的论说的确有说服力,但他将这种“范式压制”视为历史学对推测性判断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则将问题简单化了。他意在说明,历史学家不使用推测方法,是被“伽利略范式”引领科学主义裹挟的结果,可实际上历史学的实证原则并非近代自然科学范式产物。的确,尽管有巴克尔等推崇孔德主义那种模仿自然科学的主张存在,但更多奉行实证的杰出史家并非科学主义的拥趸,却仍对推测的历史判断避之不及。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对自己历史书写的材料基础极为重视。兰克讲“如实直书”却并不讲求自然科学模式的历史学。他游历欧洲遍寻史料,以杜绝推测为己任。因此,金氏试图从“范式压制”的角度为推测方法的合理性申辩的做法,为批评者发起争议留下逻辑漏洞。实际上,金氏对推测方法自古以来在各大文明中得到广泛实用的举证有一定说服力。可是,民间土法与历史学学术在严格程度上毕竟不好同论。一种方法在生活中是否有效,有极大的容错空间,而学术论断的严肃性则要求“有一

分史料,说一分话”。

其三,从史学史意义上讲,历史推测方法重经验而缺乏系统性,无助于微观史取径从新事物转化为可供推广的史学常用模式。推测方法的可靠性难免招致争议,但不可否认,金兹伯格在史料间的敏锐洞察力和对潜在可能性的大胆推测,的确使他在史料受限的情况下对小人物的微观史考察有绝处逢生之妙。他也多次试图通过强调微观史获得成功,证明这一研究取径的重要意义和进一步推广的必要性。这大概也是他不仅进行微观史实践,更不断从方法论层面总结微观史的机巧和要领的目的之一。可是,他重点解说的推测方法,对更多的研究者来说可操作性不强。推测本身是一种难以在任何参照系中进行把握的活动。对于试图在微观史取径上有所尝试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技能有很大局限性。《什么是微观史学:理论与实践》的作者马格努森对金兹伯格的推测性范式起作用的过程做了颇为传神的描述:“当微观史研究者从一个局部认识一个整体时,我们不必将此归因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灵气的那种经验,而是他们身为研究者获得的经验霎时间凝华的结果,是对一些尚且模糊不清的东西的领悟,是在一种长期试炼过程之后的直觉闪现。”^①话虽如此,但这种状态稍嫌理想化。对于微观史研究的效仿者来说,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何以在小人物的研究中使用金氏推测方法实现从个案到更普遍现象揭示这一关键环节?何以做到那灵光一现?这个尺度殊难把握,可遇而不可求。

金兹伯格是近四十年国际史学理论界的先锋性人物。他关于推测方法合理性的论证虽令人耳目一新,但总给人“用力过猛”之感。即便不以保守的立场看待他的主张,其观点仍难以令人尽数接受。佩里·安德森曾对金氏运用推测方法进行各种历史假设严词批评。^②对于金氏推崇推测方法合理性而招致批评的情况,彼得·伯克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这是因为《线索》一文篇幅有限,不足以全然表达金氏的真正意图。他说:“金兹伯格对关于他作品的误解负有责任,他只以短文而不是实体书的形式提出关于一个大主题的原创思想。在史学史立场上,他被迫匆忙完成大约两千年的材料。”^③这可能是反响不佳的原因之一,但如前文所言,金氏在此后不断丰富对推测方法合理性的解读,学界响应之声仍不多。

金兹伯格基于“正常的例外”和“推定性范式”两个概念,试图为微观史研究证明个案意味着更普遍现象的存在找到理论上的支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批微观史研究者中,他对微观史的理论探究最深、系统性最强。他的微观史理论价值在于合理地借鉴人类学模式的同时,倚重的仍是对史料中细节的文本考证做出以小见大的推测。不过,他对推测方法的有效性似乎判断过高。就微观史学在以小见大方面未能觅得理想的学理依据判断,对普遍层面的历史考察并非微观史取径能够独立完成。微观史与宏观历史的有机结合,当是最为合理有效的途径。

(作者李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130022)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Sigurður G.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g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64.

② 参见 Perry Anderson, “Witchcraft”, <http://www.lrb.co.uk/v12/n21/perry-anderson/witchcraft> [2022-12-23]

③ Peter Burke, “Reviewed Work(s): *Miti, emblemi, spie: Morfologia e storia* by Carlo Ginzburg”,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2, No. 1, 1990, p. 109.

An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 Duan Jinsheng , Jiang Zhenghu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is a complex concept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mpetition to annihilate” between the Yi (ethnic groups) and the Xia (Han people) in the pre-Qin period evolved into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 and eventually formed a larger and more stable union. The pre-Qin concept of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was a root in form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elief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The changes in its manifestations and meaning underwent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demarcation. In this process , it evolved into an order that included and integrated both the Huaxia people (Han) and the Siyi (ethnic groups) .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order between Hua and Yi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 one needs to focus on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concept of Tianxia.

Engaging in the Medieval Sensory History: Theory , Practice , and Perspective // Dong Ziyun

Since the 1980s , the study of sensory history , or history of the senses ,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such as David Howes and Constance Classen , sensory history is now grounded wi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 , sensory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enses and sensoria in history. Sensory histor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and diversities of emotional models and emotional orders ,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multi-sensoriality rather than single sensory.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 the theme of the five senses in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has been under intensive study. At present , the practice of medieval sensory history has been productive , but there is also the risk of its “etiolation”. To avoid potential pitfalls an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enses , future researchers may need to combine sensory history with socio-economic history , history of political culture , and history of legal culture.

Historical Universality in Microhistorical Studies: Rethinking Carlo Ginzburg ' s Theories on Microhistory // Li Ge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approaches of “normal exceptions” and “evidential paradigms” , Carlo Ginzburg has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of revealing historical universality from abnormal exceptions. In view of the signs of coercion and inducement in judicial files , he infers that abnormal cases may imply a general phenomenon deliberately suppressed , i. e. , “normal exceptions” . The concept of “normal exceptions” contains speculative elements , but Ginzburg reinforces the reliability of such specul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evidential paradigm” . These two concepts allow Ginzburg to work on microhistory without excessive reliance on anthropological models and to focus more on the “historian ' s craft” . However , the method of conjecture contradicts the positivist principle of historiography , and its rationality remains to be debated. Microhistory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task of discussing the universal question on its own.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remains the most feasible strategy to tackle this issue.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Koji Iizuka ' s Theory on World History // Tu Jiexin

Koji Iizuka started his theoretical work on world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His theory further developed into maturity in the post-war times. He based his inqui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he took the concepts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back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trying to overcome the “Western Centricism” , he also went beyo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dichot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post-war Japan to understand world history. In addition , Koji Iizuka ' s explora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lso contains distinct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